

#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

主编：陈登才

周文琪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 谁主沉浮

主编：陈登才 一代伟人毛泽东丛书

# 谁主沉浮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

周文琪 著

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谁 主 沉 浮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

---

著 者:周文琪

责任编辑:周果钧

封面设计:孙宪勇

版式设计:王文雅

责任校对:张爱农

---

出版者:中原农民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电 话:(0371)551756—604 邮编:450002

发行者:中原农民出版社

印刷者: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6.75印张155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400册

---

ISBN7—80538—524—6/I·233 定价:5.6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总 序

---

## ● 陈登才

在毛泽东生前，他会见过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当外国朋友把他当作世界风云中的天才人物来赞颂之时，毛泽东却十分冷静的说，我不是天才，我首先仍然是中国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实在在的说，毛泽东不是天上的“神”，而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但他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业绩表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 100 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20 世纪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的伟大变化，都同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系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新思想、新理论，创立了永放光芒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这位伟人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此，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研究毛泽东的伟大业绩和科学思想，对于我们继承他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原则，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这样中原农民出版社，积极支持出版《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一套丛书，其中包括《谁主沉浮——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理想之路——毛泽东与中国现代思潮》、《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巨人与大地——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重构世界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梅花欢喜满天雪——毛泽东的人生观》、《千古文章大手笔——毛泽东的文章风格》和《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与民主》等，就不仅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是很有意义的了。

这是因为，去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极大的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上下团结，热气腾腾，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以邓小平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实践中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又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场革命不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在这场革命的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而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毛泽东找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相统一的，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

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了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十四大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他遵循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道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社会

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就能够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使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更快，我们的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我们的事业就能够经受风险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就有可靠的保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以新的思想建设观点，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1992 年 11 月 21 日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 前 言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1/4世纪。毛泽东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进一步作了补充，具体把24年分为共产国际初期、中期、后期三个8年，指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sup>①</sup>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方针路线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它解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他们的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

---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历史条件为转移”；也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说：“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这些论述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在于，它必须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具体化，才能引导各国革命走向胜利。由于各国情况十分复杂，并且千差万别，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只有依靠亲自从事革命斗争实践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由一个远离各国革命实践的国际中心来规定各国革命的道路和方针政策，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这样做也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的。列宁自己也说过，各国的革命不能靠“从莫斯科来发号施令”，但是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却正是要“从莫斯科来发号施令”的。这样，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高度集中的领导，就不可能不犯主观主义、瞎指挥的严重错误。

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先进分子第一个杰出的代表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便是他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他在中国和东方的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发展，因而指导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 1919 年 11 月间曾经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你

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sup>①</sup>毛泽东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在中国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农民问题，并从农民问题出发，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的实践中，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到农村去，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的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sup>②</sup>。这个指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国共合作以后，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4年底，毛泽东因病由上海回湖南家乡休养，开始注意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sup>③</sup>1925年11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时，他明确说：“现在注重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8—80页。

③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改组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决议续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3月16日,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请毛泽东担任所长。

显然,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步步深入。

从1925年冬到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作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讲演,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批理论成果,对当时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其基本观点是:

一、对农村各阶级及其革命态度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曾指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中共三大和四大的决议也都提到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党的工作重点仍在城市,对农民的革命性缺少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陈独秀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sup>①</sup>他甚至武断地说:“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之间无明显的分化。”<sup>②</sup>

---

①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7页,第318页,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版。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却是从阶级关系的分析入手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中，他根据土地、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情况，把农村人口分成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种。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大地主阶级以重租、高利贷、重捐、剥削剩余劳动和包缴预征田赋等多种形式严重剥削半自耕农以下五种农民，他们“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sup>①</sup>。小地主一面剥削劳动农民，一面又受大地主军阀的压迫，他们对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毛泽东还分析了自耕农的经济状况和他们指望发财而又每况愈下的不满心态，对革命所持的怀疑、中立、观望的态度，强调一旦革命潮流高涨，看见胜利曙光时，他们“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半自耕农、半益农以及贫农“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sup>②</sup>这三种农民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都具有相当的革命性，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毛泽东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他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把学员按照省籍的不同，组成 13 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着重研究各地农村的阶级关系等实际的农民问题。每一个研究会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以及封建宗法关系等多达 36 项的调查。在进行了这样细致的调查分析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党在农民中的正确方针，这就是团结真正的朋友——自耕农以下的五种人；打击真正的敌人——大地主阶

---

① ②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1926 年 1 月 1 日。

级；而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其右翼可能是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朋友。

到了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进一步简化了农村阶级分类，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种。他说，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分为“赤贫”和“次贫”，共计占乡村人口的70%，“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中农，由于“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所以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富农，由于经济上比较富裕，在革命低潮时不愿意参加农会，甚至反对农会；当革命处于高潮时“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经过以上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农村阶级的划分为党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 二、必须建立农民的政权。

毛泽东以政权问题为核心，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和特征。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sup>①</sup>他认为，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性质不同。工人阶级目前所争取的集会结社自由，减时加工资斗争，“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

---

<sup>①</sup>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恃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sup>①</sup>毛泽东又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sup>②</sup>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强调了农民运动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大革命时期，这种农民政权的形式就是农民协会。毛泽东对当时湖南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以及农会所产生的作用兴奋不已，说：“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大力支持农民的革命专政，主张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打倒一切绅权。他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他热情地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农民群众所掀起的革命热潮。

### 三、必须建立农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

毛泽东认为，要取得农民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支建立农民武装常备队；二是大力发展梭标队。他还认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和土地问题。”<sup>③</sup>他强调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通过进行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特别是贫农的土地要求。在没有进行土地革命之前，应

---

① ②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③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先实行减租减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sup>①</sup> 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sup>②</sup>

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刀对刀枪对枪，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然而，当时陈独秀却始终拒绝发展农民武装和扩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武装，这和他历来主张不要武装是一脉相承的。在掌握武装这个根本问题上，陈独秀是远不如蒋介石的。蒋介石的命根子就是军队，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而陈独秀却忽视武装力量，“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sup>③</sup> 其所以如此，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和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有直接关系，因为当时他们都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因素。

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大革命失败的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有两个教员，即党内的陈独秀和党外的蒋介石。他们都教育了我们：搞群众运动、搞合法党是不行的。那个时候，政府里面也有我们的代表，有成百万的工人和几千万农民，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可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早晨就可以被扫光。所以……我说，党员多靠不住，政府里头有代表靠不住，有广大的工会组织和许多农民组织靠不住，只要你没有武装，其他都靠不住”<sup>④</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实际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

---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页，1952年第1版。

④ 1967年9月30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以贫农为主体的革命民众，拿起武器，采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一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成果。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是后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他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起点。

但是，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却使陈独秀忧心忡忡，深恐农民起来吓跑了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因此，对农民运动加以种种限制与打击。1926年7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指责农民运动“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于是，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就错误地规定，“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可以由“正绅代替劣绅”担任民团负责人，等等。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也引起了北伐军军官的不满和反对，他们纷纷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于1926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村上层的斗争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危险的，因为这种加剧会使资产阶级、商人和农村上层倒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只要来自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威胁存在和将来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那么，国民党就应当保持自己的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和同路人。共产国际虽然也表示同意：土地问题应当切实地提上议事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电报又强调指出，在农村中立即发动内战——在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战争正酣的